



全球化

背景下的

Globalization



现代性

薛萍 著



Chinese modernity

吉林大学出版社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现代性

薛 萍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现代性 / 薛萍著. —— 长春 :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5601—8791—4

I. ①全… II. ①薛… III. ①现代化建设—研究—中
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64496 号

书 名: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现代性
作 者: 薛萍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 刘子贵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2.5 字数: 200 千字
ISBN 978—7—5601—8791—4

封面设计: 刘瑜
长春市新世纪印业有限公司 印刷
2013 年 1 月 第 1 版
2013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 5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 501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9580026/28/29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出版序言

本书的主体是我的博士论文。

做完博士论文（2007年4月10日答辩通过），“中国现代性”仍一直萦绕脑海。这是当代中国思想理论界需要突破的一个重大问题。

一、现代性、时代精神、中国现代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现代性是现代人的主导性价值理念，是内蕴于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特质和时代精神，是现代社会特有的精神文化内涵。

西方的现代性是：人道主义目标；理性主义精神；主体性原则；个人主义价值观。“中国的现代性”是什么？现代中国社会的时代精神、现代中国人的主导性价值理念到底是什么？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2007年胡锦涛“6·25”讲话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提到了议事日程。面对当代中国社会信仰危机、思想意识多元化的现实，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实现指导思想的一元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合、引导、统领各种社会思想文化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要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么，我们现在是否形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或者说，我们现在能否提炼出明确的、能够被社会各个方面认可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观点呢？我们一直做着这种努力，对此，也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认识：

第一种，我们现在就能提炼出像西方现代性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一样明确的6~10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二种，我们现在虽不能提炼出明确的、准确的、各方面满意的、

最终能够站得住脚的6~10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拿点儿，从中国传统文化那里拿点儿，从现代实践那里拿点儿，从社会主义道德观那里再拿点儿，提出一个20个字的、笼统的、各个方面都能够接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用10~20年。

第三种，我们现在还不能提炼出鲜明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为我们比不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有300年的历史，其核心思想、制度体系已经比较清晰、完善，所以，西方的现代性很明确。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从1949年确立至今只有60几年的历史，且1949—1978年改革开放前我们实行的是“左”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左”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导致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左”的社会主义是我们要否定、破除、改革的，真正意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只有短短30几年的历史，30年这样短的时间我们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明确的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到现在为止，以上三种认识还没有达成共识。对于这个问题，中共中央主管宣传文化、意识形态的李长春同志在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决议做说明时专门讲了这个问题，他指出，概括一个全社会认可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需要继续努力。

2006年10月，我的博士论文已近尾声，2007年胡锦涛发表“6·25”讲话，已经完成。所以，本论文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概念。那么，本文探讨的“中国现代性”和我们现在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没有关系？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呢？

本文讲的“中国现代性”和我们现在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质上是一个东西。中国现代性——现代中国社会的时代精神、现代中国人的主导性价值理念也就是我们要确立的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不过“中国现代性”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叫法不同、侧重点不同、角度不同：“中国现代性”侧重“中国”，侧重“中国与西方的区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侧重“社会主义”，侧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区别。而“中国与西方的区别”恰好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区别。现代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中国的现代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中国现代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伟大的实践背后一定有伟大的理念起作用，那么，这个支撑中国伟大实践的伟大理念是什么？是实事求是，“和”思维，民生民主。实事求是，“和”思维，民生民主就是当代中国的现代性。

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中国文化的智慧，它最早出自汉朝班固撰写的《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文中班固赞扬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从刘德的生平和事迹来理解这句话，意思是说，刘德在修礼乐、学经典时，喜好先秦诸子的古书，对旧书“求真是”，“留其正本”。刘德的“实事求是”是考证古书时的求“真是”，讲求的是务求圣贤经典原义、真义的严谨治学态度，是一种求真的学风。

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实事求是”思想精神。毛泽东把中国古代文化人修学考古认识领域的“实事求是”精神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革命实践，扩展了实事求是的使用范围，提出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破除了对苏联共产国际的迷信，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苏联革命的中国革命的成功道路，发挥了实事求是对于中国革命、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

1976年，“四人帮”垮台，一个时代结束。拨乱反正，统一全党、全国人民思想成为首要任务。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破除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思想意识被重新唤醒。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把“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结合起来，要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破除“本本”教条、“思想僵化”、“迷信”权威，解放思想是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的主观前提条件。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牢牢抓住“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髓。小平同志曾坦白地说：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泽东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

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① 邓小平不是像哲学教科书那样，把实事求是只看作是从唯物论推导出的一个一般方法论，而是从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看待实事求是，邓小平把实事求是看作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邓小平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精髓……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② “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③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④，“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出发点、根本点”^⑤，“我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⑥ 小平同志把实事求是精神渗透、贯穿于自己的全部思想、实践之中，实事求是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灵魂。邓小平的“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猫论”；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摸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不争论”都出神入化地诠释了实事求是的求真务实的精神实质。在邓小平那里，实事求是是不是追求普遍规律，也不仅是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个逻辑推论，更不是离开人的现实生活的中性方法论；在邓小平那里，实事求是就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是解决中国现代化建设中一切重大理论、实践复杂、疑难问题的妙药良方。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提出判断我们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对实事求是的价值自觉。事实上，实事求是从来不是与价值无涉的中性认识方法，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实事求是一直负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共识和实践理想。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是要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苏联革命的中国革命成功道路，使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邓小平的实事求是是要破除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教条，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在邓小平那里，没有一个先验之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38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38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43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18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14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0页。

“是”——现成的普遍规律放在那里，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一场革命，是中国创造、中国特色，所以，邓小平提出要解放思想，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实事求是作为一个实践过程就是“摸石头过河”；实事求是作为实践的认识环节就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理论创新。

“是”既然不是普遍规律，那么，“是”是什么？“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成功的道路、途径、方法，这就是我们要找寻的。那么，怎样才算求到“是”了，判断是否实事求是的标准是什么？这就是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们的实践、工作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是正确的、有价值的，就是实事求是；我们“试”、“闯”、“摸”得对不对，价值标准就是“三个有利于”。

从古至今，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实事求是的内涵和外延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不断地改变着。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人对于“实事求是”逐渐形成同我们现代人的生活、现代人的思想观念相一致的新的认识；实事求是的应用范围也从认知领域扩展到宏观社会革命和建设领域，进一步深入到微观人民群众个体生活实践领域，实事求是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宏观社会实践的指导原则，而且已经深入到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之中，成为中国人的世界观。

实际上，随着毛泽东时代乌托邦的社会主义构想的挫败，中国的老百姓已然从对未来虚幻、浪漫的理想回到当下的社会现实。不再被蛊惑、不再轻信、不再盲从，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过好自己的生活，已成为中国人的世界观、生活理念。

“和”思维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范畴。“和”主要有四重涵义：第一，和谐，阴阳矛盾双方对立面的统一，促成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体或对立面的和合体；第二，调和，使不同因素协调和解，维系事物的有序运转；第三，中和，强调“适度中节”、“以他平他，有制衡的动态功效”；第四，和合，强调“天人合一”、“阴阳之序”。透过太极图和谐圆融的系统图式，我们对“和”的本义会有直观的体会：“和”就是太极图的圆圈，是维系阴阳鱼对立统一的矛盾和合体。

“和谐”、“调和”、“中和”、“和合”思想紧抓“和”的本质，形成了体现中国传统哲学精髓的“和”思维矛盾整合观。

“和”思维及其精神贯穿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早在先秦时期，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①。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②“礼子用，和为贵”^③；先秦以后，“和”的思想进一步得到发挥，汉代董仲舒构造“天人感应”的大一统体；魏晋南北朝郭象以“独化论”“和”了名教与自然的论争；宋明理学和心学、道器、理气、心物的对立有形而上的理性思辨或良知践履中达到“和解”；明清崇尚“和”，皇宫大殿以“太和”、“中和”、“保和”冠名，普通百姓也以“和”为贵，讲究“和气生财”、“和睦相处”、“家和万事兴”、“平和”、“和顺”、“和美”、“和平”、“和谐”。“和”思维及其精神渗透到每一位炎黄子孙的血液里，人们用“和”思维认识事物，按“和”思维行事。

“贵和”、“尚和”、“求和”精神，使中国人谋求“物我一体”、“天人合一”，把自然、社会、人本身的和谐共荣作为追求目标。天理即人道，道法自然，“天人感应”，人与自然相通，自然与社会相合、共生共荣。

处理问题的“和”思维决定中华民族是一个安全、和平的文明民族，中国人处理问题是在坚持一定的原则立场，在不失独立性和主体尊严的前提下，以“柔和”的方式解决问题。“和”思维方式下，矛盾是被接受而不是被克服的，或者说，矛盾的克服是以“和”的立场加以接受的。这种思维导致中国人在承认矛盾分歧的同时，力图寻求能够被广泛接受的化解矛盾、解决纷争的道路，而不是通过强硬的武力来极端地解决矛盾。

与中国文化“和”思维正相反的是西方文化的“分”思维。西方文化对待任何事物首先要以知性的思维方式加以“分析”。西方哲学强调事物内部矛盾的分裂本性，以“分”作为辩证法的根本特征。自古希腊柏拉图以来，西方人就把原本统一的世界一分为二，即感性的经验世界和超感性的理念世界。“分”思维同样存在于西方政治观念中，

① 引自《孟子·公孙丑下》

② 引自《论语》，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页。

③ 引自《论语》，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这主要表现为西方基本政治价值观所坚持的“原子式”的个人本位。西方文化没有把个人的独立性消解在人的伦理依存关系中。在市场经济和资本制度下，人是独立的个体，个体的独立性通过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得到确立。

“分”思维到了西方近代得到进一步发挥，形成主体性思维。近代以来，科技发展，生产力提高，人类战胜自然能力显著增强，人类开始雄踞主体宝座，人类要战胜自然、主宰自然。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儿首先开启了“我思故我在”的哲学主体性转向，通过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实现了主体“人为自然立法”、“人为道德立法”，经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到“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最终实现了主体主义的自我完成，主体性精神大获全胜，发展至巅峰。

主体主义的现代社会，人从自然束缚、宗教压抑和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获得了空前的独立性、自主性，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得到了空前的发挥，主体主义的现代社会对人的发展赋予了最积极的意义、最优良的环境。然而，主体性自身包含着无法克服的矛盾：主体性张扬；主体、客体二元分裂、对立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把人预定为主体，意味着把人之外的一切统统归为客体，成为供人认识、改造、征服、占有、支配的对象，人成了目的和价值的中心，自然万物成了满足人需要的消费品；人成了自足的无需外求的存在，人失去了与自然界的正常关系，最终成了疯狂的、孤家寡人的、绝对的主体。主体性思维忽视了人的有限性、脆弱性，造成了近现代史上主体性的盲目扩张，从“主体性的凯旋”走向了“主体性的黄昏”，引发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三重关系紧张冲突，造成了人类的生态家园破坏、社会家园失和、精神家园荒漠。

中国文化的“和”思维明显明智、聪慧于西方文化的“分”思维。“和”思维及其精神在扬弃极端的个体主义、主体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人性智慧层面上，彰显出它的现代价值。如果握有现代科技利剑，雄踞主体宝座的现代人能够实现由主体性思维向“和”思维的转换，必将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三重对立、紧张关系的“和解”。“和”精神在全球化的当代，对于国际交流、合作、对话，对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对于启迪人类选择一种合理、合乎人性、文明而不是野蛮的处理问题方式、交往方式、社会生活方式将会发挥积极的作

用。

西方“分”思维把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欧洲“分”成了众多国家，中国文化的“和”思维“和”出来一个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中国。“和”思维使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爱国主义情怀。血浓于水，中华一家亲，炎黄子孙无论走到哪里，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在涉及国家民族尊严的时候，中华儿女会空前团结，迸发出巨大的力量，这是“分”思维的西方无法比拟的。

与中国文化“和”思维一脉相承，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协调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协调社会各个阶层、集团的利益关系，统筹兼顾、协调发展，这也就是要“和”，构建一个和谐社会。“和”思维在我们今天中国的社会实践、日常生活中仍然无形地发挥着重要作用。

民生民主 “民生”作为中国特色的政治目标起源于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之一——民生主义，民生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改善当时中国普通大众的生存和生活状况，实现国富民强。在饱受外侮内患的背景下，追求中国富强的历史与现实决定：当代中国民生民主是民生民主，民生是中国共产党的着眼点。

民主作为组织与动员社会成员的方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在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和任务密切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团结全体人民，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根本区别。

从历史上看，中国宗法社会的先民们长期束缚在土地上，形成了重土轻迁，父母在不远游，眷恋家园、国土的情怀。传统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是家国一体模式，家是国的缩影，国成了一个扩大的家。中国人认为，人伦、人情、人缘三位一体，个体的价值只能依赖群体而实现。中国人无处不在关系之中，每个人都是他所属关系的派生物，只有把“自我”放到各种人伦关系中，才感到踏实、安心，似乎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意义和价值所在。离开关系，中国人不知该怎样生活，不知为什么活着。个人在家庭、君臣、邻里、朋友关系中是一依

存的分子，没有独立“自我”的空间和余地。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是在各种关系中思考，要权衡、平衡、协调各种关系，而在这种权衡、平衡、协调之中，“自我”就被牺牲掉了。

如此家庭，如此国家，如此人伦等级秩序，必然形成中国传统社会重整体、轻个体的基本价值取向。从古至今，中国人重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社会利益，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甚至以公灭私的思想深入人心，形成了中华一体的凝聚精神，铸就了中华民族为国为家临危不惧、坚贞不屈、历劫不覆、舍身取义、天下为公的民族精神。这种整体主义价值观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不屈服恶势力，坚决与外来的压迫作斗争；这种整体主义价值观增强了中华民族的亲和力、凝聚力、向心力、自尊心、自强心，实现了中华形神一体。

整体主义的一个直接结果、优势是效率——国家与集体获益的效率。为国家、集体整体利益，个人甘愿受损，这种情况达到最大（即“以公灭私”）时，国家、集体是最有效率的。

中国传统伦理的重整体、轻个体的价值取向与西方崇尚个人与自我的伦理价值观正相反对。这种中西伦理价值观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必然导致中西方民主的基础前提不同。中国民主的基础前提是国家民族集体利益至上，西方民主的基础前提是个体利益至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实践和反复探索，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基本框架的人民民主的制度体系。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体系，它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政治保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真实的民主、广泛的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掌握国家政权并享有广泛而真实的民主权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这就决定中国的民主不受资本的操纵，不是少数人的民主，而是最广大人民的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作为根源于、服务于公有制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必然是为了实现人民当家做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反映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更好地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保障和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不仅要实现全体人民的政治平等，实现政治民主，还要实行经济民主、社会民主。这是中国民主的真实性、广泛性的一个重要体现。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民主意味着：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广大人民群众对企业以及相关经济事务享有管理权。民主深入到经济领域，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在生产与再生产活动中拥有权利，其政治权利才有坚实的基础。

社会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领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社会民主主要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展社会自治和基层民主，让人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管理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各项社会事业发展还不平衡，有的领域相对落后，远不能担负应有的责任。因此，社会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相对薄弱的环节，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需要重点探索和发展的领域。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特征。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缺一不可。离开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就会落空，中国就会退回到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境地，党的领导是人民组织起来、行使当家做主权利的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离开人民当家做主，不受人民监督，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就会失去方向和意义；离开依法治国，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就会失去有效的途径和可靠的保障。

民主是历史的、具体的，世上从来就没有抽象的民主、“普世”的民主、一成不变的民主。对于一个国家的民主建设来说，关键问题就是要根据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任务和社会条件选择合适的民主形式。只有符合国情，适应特定社会发展阶段和发展要求的民主形式才能承载和表达民主的实质。适合于某一个国家的民主形式，未必适合其他国家；适合这个阶段的民主形式，未必适合另一个阶段。生搬硬套别国的民主形式常常会“水土不服”、南橘北枳。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十分注意从实际出

发，根据现阶段的国情和任务，决定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使民主政治建设与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民主形式与现有的社会条件相适应，既不超前也不滞后，循序渐进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动员、团结和组织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使社会充满创新活力的基本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在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方面体现出明显的制度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最真实、最广泛的民主，能够真正实现和落实人民当家做主的原则。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是由金钱与资本主宰的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形式上的民主。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人民才能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人依法享有的民主权利，是不受财产、职位、民族和性别差异限制的平等权利。在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了我国人民的自由与权利，人民可以依法选举人民代表，依法对国家和社会事务实行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政治上的主人；在社会文化生活中，人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享有信仰自由、文化创造与文化享受的多种、广泛的文化权利，人民群众真正成为文化上的主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真实地享有主人翁的地位，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能够被充分地调动和发挥出来，这一切为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们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所证明。

在西方民主制度下，国家政策是各个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往往是势力大、实力强的资本集团占上风、获利多。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必须通过充分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来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完成这一任务，最根本的就是要使国家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正确地反映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中，处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任何一个利益集团的代表，没有自己的一党之私，而是全中国各民族人民的代表。因此，中国共产党能够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和要求，正确地把握全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长

远利益、根本利益，制定出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实现人民利益的最大化。

中国是一个处于快速发展中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世界各国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普遍遇到的问题，如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和社会差别扩大等。一个有效的民主制度，能够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在现代化进程中维持社会处于基本均衡状态。近年来，党和国家针对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及时解决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使社会发展具有可持续性。中国通过自身调整解决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无法解决或不能很好解决的障碍与问题，说明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实现社会共同利益的优势。

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创造者，也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中国共产党不仅控制着社会各个领域的权力，也控制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权力，它决定着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掌握着干部的选拔和任用，决定着人们的政治价值和政治文化的内涵等等。在中国政治体制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各个层面，中国共产党都处于核心领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在改造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同时，也改造了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并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重新塑造了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改造主要表现在，它把一系列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创造的政治理论和政治观念带入了中国，这些政治观念以及中国共产党以此为指导进行的政治实践改造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使新中国民众的政治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后，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西方政治思潮的大量涌入，使中国当代的政治文化再次产生了新的变化。

三、中国现代性与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具有遗传性，变异只能是在遗传基础上的变异，就像一个人，一定是具有父母的遗传基因，虽有变异，也是“家族相似”的。中国传统就是中国的基因，无论怎样变异，中国还是中国，深入骨髓的东西是难以改变的；而中国由于没有西方的传统，因而也无法生长出西

方的现代性，就像你看着一个美人的照片不能长得像这个美人一样，因为你不具有她的基因。

但是“条条大路通罗马”，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中国也一定是在保留自己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性中一定会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

“所有人类社会，从最原始的到最进步的，构成一连续体”。^① 传统与现代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断的“连续体”。现代不是传统的断裂，而是传统的承接、继续和发展，现代性（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特质、现代人的核心思想价值观念）是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基于新的社会现实保留下来的传统、发展了的传统、变异了的传统。传统中的一些东西在现代性中保留下来，甚至发扬、光大（传统中不适合新时代的东西逐渐被淘汰）。历史、文化不会断裂，只能是承接、发展的。

一种文化传统往往与一个民族的历史、生活、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紧密结合在一起，它不仅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更浸润于人们的心理、思想观念中，持久地发挥作用。一个民族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正视自己的文化传统，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使传统成为现代化的助动力。

文化传统没有好坏之分。一种文化之所以存在，必然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巨大的价值。西方文化指导西方现代化取得了成功，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流文化的东方文化圈的国家 and 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同样取得了现代化的成功。按照辩证法来讲，任何事物都有好坏、优缺点两面，并且，在一定意义上讲，优点同时就是缺点，文化也是如此。西方文化指导西方发达国家取得了现代化的成功的同时，又引发了西方社会灾难性的“现代性问题”；中国传统文化铸就了一个五千年辉煌历史的文明古国，同时又出现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的落后以及当今处于强势西方文化的压力下生存和发展的困境。一种文化传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我们必须在这个现实的基础上去发展、去创造。

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取得了成功，作为指导西方现代化取得成功的主导理念——西方现代性精神，是对西方文化传统的传承。在西

^① C. Kluckhohn: *Mirror For Man*. (Mc Graw - Hill paperbeck 1949.) p. 46

方现代性中镌刻着西方传统文化的深刻印记：古希腊罗马哲学的印记、中世纪基督教的印记、近代主体性精神的印记。西方的现代就来自于西方的传统，没有西方的传统，就没有西方的现代。西方现代社会的精神特质、西方现代人的主导思想价值观念——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人道主义、主体主义、个体主义、自由、平等观念的雏形就存在于古希腊罗马哲学、基督教和近代主体性哲学之中。没有古希腊罗马哲学、基督教和近代主体性哲学，就没有西方的现代性精神，也就是，没有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就没有今天西方的现代性精神。

我国正在进行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形成中国现代性时代精神。我们应当明确，中国的现代化不是西方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性也必然有别于西方的现代性。而中国现代性精神的形成如同西方现代性承接了西方文化传统一样，也必然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它滋养了世世代代的华夏民族、炎黄子孙，虽然历经五四运动以来一次又一次的“打倒”、“破除”、“扫荡”，它仍然顽强地生存着、发挥着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中国社会只能在这个传统基础上向前发展。完全否定传统的历史文化虚无主义可以存在于理论之中，但在现实上是做不到的。我们现在能做的是，顺着传统发展，承接文化传统，继往开来，取得现代化建设的成功。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许多优秀的、适应我们这个时代发展需要的宝贵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是内求认知。儒称“内业”，道称“内丹”，佛为“内明”之学，医曰“内景”，武曰“内功”，儒、道、佛、医、武都向人之内（体内、心内）探索。内求是追求人内心的安宁与完满，而非人之外宇宙的自然法则。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向求善思维对于克制、平衡现代人的物欲奢求，加强自身内在修养有着积极意义。

“贵和”、“尚和”、“求和”，谋求“物我一体”、“天人合一”思想，对于缓解现代社会人与自然的对立、紧张关系，实现自然、社会与人本身的和谐共荣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中庸是中国传统文化做人处事的智慧。中庸深谙阴阳转换、两极相通、相生相克这些事物本身的辩证法，既全面，又灵活，是一种高超的人生智慧和境界，远远高于形而上学简单化、片面化的要么 A、